

中国模式

ZHONGGUO MOSHI 经验与困局
Jingyan yu Kunju

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什么模式可以仿效和追求。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从任何主义出发，来做些无结果的理想的实践，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重建。

郑永年 著

中国模式

经验与困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永年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213 - 04190 - 7

I. 中… II. 郑… III. 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667 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模式
——经验与困局 |
| 作 者 | 郑永年 著 |
| 出版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
| 集团网址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
| 责任编辑 | 王利波 |
| 责任校对 | 张志疆 |
| 电脑制版 |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 × 100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6.25 |
| 字 数 | 22.8 万 |
| 插 页 | 2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213 - 04190 - 7 |
| 定 价 | 32.00 元 |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使用的图片,个别未能联系到作者,敬请作者与出版社联系并领取稿酬。

前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 21 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却发生在本世纪。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因而讨论中国模式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就是说,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 90 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

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等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论调。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很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

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三十年。尽管从数字上看,三十年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人们会感觉到这三十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三十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三十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进而,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前三十年可以理解为“试错”式的发展,从而为后三十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六十年。

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时期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三十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三十年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只能说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同时也要意识到,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

三十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都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随后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崩溃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普金执政,进行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就被视为开始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民众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不过,尽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已经很浓,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显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

本书收集的文章是我过去很多年里对中国模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几个层面进行,包括中国模式是什么,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是什么。很多研究者在涉及中国模式问题的时候,往往关注中国模式应当怎么样

的问题。在很多年的研究里,笔者不太涉及理想层面的问题,因为很难回答应当怎样发展的问题,并且如果过于流于抽象,对实践的发展也并无多大的帮助。这里收集的文章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观察,就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观察。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理解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比较的角度。就是说,笔者在这些文章里意图从中国的视角(历史)和国际的视角(比较)来对中国的模式作些探讨。应当强调的是,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一则是因为,如上所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不深入;二则是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把这些思考文章发表出来,主要是期待能引发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这里收集的文章之前曾经在各种国际性或区域性会议上发表过,大多也曾在中国的一些大学以讲座形式发表过。此次能够结集出版,必须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楼贤俊先生、副总编辑张建江先生以及王利波女士。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推动,笔者很难下决心花费时间更新这些文章。

2009年8月

中国模式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 1

第一讲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 1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 2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 4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 5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 6

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 7

第二讲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 9

引言：余英时 vs 姜义华 / 10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 12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 17

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 25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 30

第三讲 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 / 33

引言 / 34

国家与民主 / 35

国家、民主和发展中国家 / 43

国家建设和中国的民主化 / 45

第四讲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 57

政党、国家建设和民主 / 59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 / 66

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党的第二次转型 / 80

第五讲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 85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 86

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 89

中国的渐进民主化 / 94

第六讲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模式 / 97

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 / 98

中国的复合经济模式 / 100

社会改革和中国模式的改进 / 108

第七讲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 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 113

中央地方关系问题 / 114

现象的根源 / 118

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 120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 126

选择性集权、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 131

第八讲 放权改革: 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 137

两种分权概念 / 138

政府间放权如何造就经济的高速增长 / 142

政府间放权的负面后果与重新收权 / 146

国家—社会放权的举步维艰 / 150

结论: 进一步实行国家—社会分权 / 160

第九讲 必须保卫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政策 / 163

发展动力与社会后果 / 164

曼库尔·奥尔森和卡尔·波兰尼 / 166

开放与市场发展 / 170

开放政策不均衡的影响	/ 173
政治改革和利益代表	/ 178
社会开放和不均等的政策参与	/ 180
为什么必须保卫社会	/ 184
第十讲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 187
农民与民主	/ 188
中国农民的新特质	/ 191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形式	/ 193
乡村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设	/ 195
简短的结论	/ 201
第十一讲 农民与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点	/ 203
作为一门显学的农民民主	/ 204
理论认识的进步和现状	/ 206
现存理论的批判	/ 211
农民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	/ 215
简单的结论	/ 220
第十二讲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 221
新加坡能不能学？	/ 222
权力的有效集中	/ 223
融政党于社会	/ 225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 228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	/ 231
领袖的作用	/ 233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政改前景	/ 234
结 语：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 239



第一讲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 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

◆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

◆ 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前不久受邀到哈佛大学参加由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的第十三次国际发展会议。因为是强调发展,会议的焦点自然落在与发展有关的主题上,包括增长与整合、治理与制度、教育与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卫生与发展等。主办者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经验供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照。整个会议只有一场讨论,议题集中在个别国家的(特殊)经验上,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将来发展得好,中国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应主办者的要求,我作了一个题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中国经验”的演讲。如果把中国的经验放在国际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确有很多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总结中国的经验自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把演讲提纲和问答笔记整理出来,供读者讨论。

中国的经验有很多,但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主要可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讨论。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首先,我不同意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

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在不同发展中国家,因为内部情况的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改革也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实际上,单单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人们经常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往往反反复复,很少有一帆风顺的。

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化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并不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但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以后,民主化则是有可能的。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的机构改革就属于这个范畴。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除了民主化,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转型往往给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带来莫大的压力。在一些国家,政府面对多重压力无能为力。在中国,多重压力主要是通过两个方法来应付和消解的。其一是改革的渐进性。渐进改革表明改革并非革命。中国没有采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方法,而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改革的渐进性使得中国有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其次,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了,

而是说在经济改革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个阶段,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有序的社会改革还是要靠政治改革来保障的。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第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这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几十年前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观点。^① 这个观点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还是适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很难得到发展。国际资本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如果不开放,国际资本就不会进来。但光开放还不够,还需要秩序。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国际资本,更是这样。实际上,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所表明的,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原有的发展成果也会很快付诸东流。前苏联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或者群体事件,但政府保证了基本社会政治秩序。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中国在吸收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处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于领先地位,这应当和中国的社会秩序有关。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第三,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因此,西方各经济学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依靠法治来保护产权。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发达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里,法治是产权最有效的保障。但西方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治来保护产权,并不见得公平。如同民主,西方法治制度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演进才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短时期内建立有效的法治并不现实。关键在于,在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其他的产权保护机制。

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提出了要建立法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更是把建设法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无数的法律和规章,不能说中国不重视法治。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设施,很多法律和法规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困难重重。在产权保护方面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产权保护,那么又如何来解释中国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呢?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就变得不可避免。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建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亲商”或者“亲发展”的政府。中共修改党章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享受政治权利。中国的宪法也已经修订来保护产权。在经验层面,中国各级政府对资本和产权的保护已经大大超越了法治的程度。地方政府为

了应付竞争和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以政治和行政手段为资本提供额外的保护和额外的激励机制,如压低工人的工资,廉价出让土地,等等。但是应当看到的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方式保护产权有其先天的不足。因为政治和行政权力的介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往往得不到制约。过度的权力往往会造成对产权和其他各种权利的侵犯。资本的权利得到保护了,但劳工和农民的权益却往往得不到保障。很自然,有些场合,过分的权力也会侵犯资本的权利。

政治和行政手段不可避免,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否从政治和行政的保护转型到法治的保护。在这一点上,中国最近通过的物权法显得意义重大。尽管中国国内对这个法律有诸多争论,但这一法律的通过是一大进步,它表明中国对产权的保护已经开始从政治和行政的方法转型到法治。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第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所有经济活动并不发生在抽象的空间内,而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空间里,任何经济交易都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者说,经济生活不能独立于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活动本身的意义要到社会关系中来寻找。社会的正常运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前面所说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基本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社会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经济活动能够给基本社会正义创造经济条件,但经济活动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并不见得都是正面积极的。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对社会群体不能给予同等的机会,社会正义就难以得到保障;如果由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大量财富在社会群体中不能公平分配,那么社会正义也难以得到保障。而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会成为可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的阶段并不缺乏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发展没有持续下